

登封农民发明“大跃进”背后的尴尬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文/图

核心提示

登封市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从市里到各个委局甚至各乡镇都相继出台了有关鼓励科技发明的政策。

2008年,该市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发明专利243项,其中该市大冶镇农民发明的专利申请高达234项之多,如今已经被授权的有23项。一个乡镇的农民缘何会发明这么多专利呢?这种“大跃进”式的专利申请如今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困局,因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很多发明成果难以走出“深闺”,成了难养的“金娃娃”。

一个市的科技发明指标

2009年7月26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的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上,河南有8个县市入围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其中登封市名列第65位,比上届提高3位。这种渐进式的提高,让登封市付出了巨大努力,这其中就包含科技创新考核标准,硬性的考核指标也促进了登封市科技创新的全面发展。

其实早在2007年,登封市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在全市开始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通过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双高”、“双小”、“双建”、“双引”、“双合”、“双创”等6项活



刘怀昌谈起发明专利转化显得分外惆怅

动,以此达到提高企业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当年4月份,登封市召开科技、知识产权会议。会上主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与各乡镇、有关委局以及部分重点企业签订了2007年度专利目标管理责任书,各项专利指标落实到户,责任到人。专利工作实现目标管理是登封市为进军全国“百强县”之列而制订的一项硬性指标。登封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单位都要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促进登封专利事业的快速发展,推进科技强市建设,保证各项专利目标如期完成,为登封市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系列针对性活动的开展,使登封市快步踏上了科技创新的道路,也使该市逐渐跨入到科技强县的行列中。同时,在推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今年67岁的吴鲁智还未退休,他主要负责该镇科技工作,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按照年龄,其实我早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放不下对科技这份工作的热爱,特别是现在基层太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才了,我是咱们全国第一个拥有正高级教授荣誉的基层科技工作者,也是郑州农技推广战线唯一一个正高级专业人员,按照规定我可以干到70岁才可以退休,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干下去的。”

谈起大冶镇近年来的科技热,吴鲁智显得格外自豪。他指着办公室墙壁上的各种荣誉证书和证书说:“在大冶镇这个地方,可谓是人才辈出。你看,这些奖章和证书是最好的证明。大冶镇在科技创新这方面近几年一直按照登封市相关规定进行发展,并且还出台了

很多鼓励性措施,以此来激发全镇企业和农民的发明创造热情。仅2008年,我们全镇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申请就高达234项,其中有23项专利已取得授权,其他的也已经授

一个镇的“疯狂”科技发明

权。这个数字几乎是整个登封市的总和。”

大冶镇缘何会有这么多项发明专利呢?对于记者的这个提问,吴鲁智感慨地说:“以前群众对这项工作都不是太懂,有关这方面的宣传也不多,很多群众自己搞的小发明小创造都是悄无声息地运用到生产生活中,也不知道去申请什么专利。最近几年,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宣传力度大了,并且还有很多奖励措施,这使得那些发明者知道了自己所发明的东西价值有多高,所以很多群众开始纷纷申报专利,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

对于农民科技热现象,大冶镇人民政府在2007年4月份相继出台了红头文件。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凡专利申请第一申请人为该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户籍在该镇辖区的个人申请获得授权的国内专利,并且其发明创造符合该镇的产业发展方向,均可申请专利费补助。专利补助分为发明专利补助1500元,实用新型专利补助1000元,外观设计专利补助800元。

在大冶镇2008年度专利申报、授权、科技成果鉴定统计表中记者看到,2008年该镇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有66项,实用新型专利106项,外观设计专利为62项。获得专利授权并领取专利证书的发明创造均为实用新型专利共有23项,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鉴定的科学技术成果1项。

大冶镇农民的疯狂科技热,激活了农民的创新能力,一些发明者却显得很困惑。在自己的发明创造无法转化,成了养在深闺中的“闺女”。

大冶镇大北村农民刘怀昌就是一个发明爱好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从1987年开始搞专利发明,当时政府不反对也不支持,自己想做好一件事心里舒服,所以就自己鼓捣一些东西。但是大多发明都是通过别人的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创新,进一步改造成自己的发明专利。”

如今,刘怀昌发明的专利已达近百项,其中拿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有14项。2006年,他发明的无刺鱼的加工方法这项专利以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让平顶山一家公司使用。后来通过平顶山这家公司牵线,他又以360万美元把该项技术的所有权卖给巴西一家公司,除去一些中介费用后,他最后只拿到

一个农民发明者的困惑

科技发明热,让更多群众从中深切地体会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但是在这个真理的背后,一些发明者却显得很困惑。自己的发明创造无法转化,成了养在深闺中的“闺女”。

大冶镇大北村农民刘怀昌就是一个发明爱好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从1987年开始搞专利发明,当时政府不反对也不支持,自己想做好一件事心里舒服,所以就自己鼓捣一些东西。但是大多发明都是通过别人的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创新,进一步改造成自己的发明专利。”

如今,刘怀昌发明的专利已达近百项,其中拿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有14项。2006年,他发明的无刺鱼的加工方法这项专利以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让平顶山一家公司使用。后来通过平顶山这家公司牵线,他又以360万美元把该项技术的所有权卖给巴西一家公司,除去一些中介费用后,他最后只拿到



专利证书、转让合同、各种科技荣誉贴满了墙壁

了不足100万美元。这使刘怀昌再次深切地体会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其真谛。

有了钱后,刘怀昌拿出近百万元,帮村子里打机井,解决村民们的饮水难问题,帮村里修路解决出行难问题,并且还拿出很大资金帮村民搞养殖,期盼以此能够带动全村父老乡亲们走上共同致富道路。

然而,挣到大钱后的刘怀昌内心深处却非常困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言:“虽然现在我有钱了,但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手里还有10多项发明专利却成了烫手的‘金娃娃’,这些专利有的已经闲置了很多年,有的一次也没投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扔掉吧觉得可惜,毕竟是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进行推广吧又没门路,况且也很难寻找到合适的‘婆家’,为这事我苦恼得寝食难安。发明人最痛心的事就是,自己费尽心血发明创造出来的东西无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生产或生活中。我不在乎钱的多少,哪怕一分钱不给我,只要能用到社会生活或生产中,那就证明了咱们的发明创造有价值。”

“大跃进”式发明背后的尴尬

刘怀昌与其他农民发明者相比是较为幸运的一个,而类似他这样的很多农民发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很多人甚至呕心沥血倾家荡产搞成的发明创造,最终却成了养在深闺中的“闺女”无法转化生产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冶镇的秦丰伟在2008年专利申请中,他个人申请专利高达69项之多。在大冶镇类似他这样疯狂申请专利

的人还有很多,这种“大跃进”式的发明背后如今面临着诸多尴尬和无奈。

专利推广难、转化难是一直困扰专利拥有者的难题。目前,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超400万件,但专利转化率极低,产业化难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当今全球金融风暴下专利转化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如何改变“农民发明家”这种尴尬的冰火两重天局面,有关专家认为发明者和有关部门两方面都要努力。

从农民发明者来讲,要及早查询、掌握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先清楚自己的研究发明对象是不是领先的。研究发明过程也要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资金、能力、条件等情况来搞研究发明。再有就是最好因地制宜搞研究发明,不要搞高精尖,尽量搞一些短平快、立竿见影的实用技术发明。

从政府部门来讲,最好明确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对包括农民在内的非职务发明人的管理,给农民发明者和生产企业、投资方之间提供更多交流服务的平台,同时财政部门要划拨一定的经费,用于非职务发明者的项目开发实验、产品宣传推荐、交专利费、会务费及展位费等。从现有科技计划渠道中最好划出一小块,允许包括农民在内的非职务发明人申请,以取得政府资助,用于开发研究、创建企业、实现产业化等。

一些民间发明人的不幸遭遇屡屡提示我们,有关部门应当抓紧建立和完善保护民间发明专利、鼓励民间科技创新的社会机制。国家要尽快建立适应民间科技发明专利事业需要的投资或融资风险基金体系,激活民间科技发明专利中蕴藏的巨大物质能量,推动国家科技发明事业和谐发展。

新闻时评

80%捐赠流入政府专户的担忧

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达到767.12亿元。清华大学的一支团队调研后发现,这些捐赠款物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额外税收”,由政府统筹用于灾区。(《中国青年报》8月12日)

“80%的地震捐赠流入政府财政专户”,这让参与调查的专家团队深感忧虑。隐忧主要指向的显然并不是地震捐赠的具体使用效益问题,而是捐赠流向、支配格局所折射的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生态处境——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状况,仍然远不如人意,“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此种处境和现状,虽然相当令人担忧,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的生成和出现本身其实并不是突兀、孤立的——而是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失衡,也即国与民之间关系失衡环境下的一种必然产物。

其一,在社会财富、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上,国与民关系的失衡。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武志此前的研究推算,2007年,在中国的财富结构分布中,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仅为27.6万亿元,反而政府所拥有和控制的资产加上财政收入、土地资产、国有资产等,总计高达88万亿元,占全部社会总资产的76%以上(《经济观察报》6月19日)。在这种大的财富资源分布结构之下,“80%捐赠流入政府财政专户”当然不足为怪。

具体到地震慈善捐赠,一方面,很多捐赠本身就是以体制内的方式实现的和完成的——捐赠者和捐赠的组织者以及捐赠的接收管理者均完全处于体制内,整个过程原本就无须与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发生多少关系;另一方面,即使外部纯民间的慈善捐赠,也不得不纳入政府体制内既有的强大资源控制体系中来,由政府统一分配。

其二,在权力(利)层面,国与民关系的失衡,也即权力强势而权利弱势。在现代国家,如果说各种政府组织机构,是权力的主要载体的话,那么,民间性公益组织、社团,就是权利最直接具体的表征了。因此,一个权利充分张扬、受尊重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间组织发达、活跃的社会。这正如清华大学团队专家所指出的:“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反之,一个权力十分强势,管得宽过死、甚至无孔不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权利相对弱势、民间组织严重发育不良的社会。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正是一种权力强势权利弱势、国强而民弱的状况。

据研究者保守估计,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实际已达300万家,但经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仅约40万家。这表明,一方面,大量事实上的民间组织受制于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如民间组织在登记时须有“业务主管单位”,也即必须找一个官方机构作为“婆婆”,而不得被动地处于非法、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现有的那些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并不是严格纯粹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而是政府机构“主管”之下,具有浓厚权力色彩的半官方组织。显然,在这里,权力与权利的基本法治关系,不仅失衡且有颠倒之虞——不是权利派生权力、权力附属于权利,而成了权力生成权利、权利依附权力。张峰

杭州车改是“风向标”还是“墙头草”?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向以东方休闲之都自居的杭州最近颇不宁静,不宁静的“肇事者”似乎都是车惹的“祸”:连续两个月来,因为那个可恶的“70码”,两条鲜活的人命消失了。而8月12日来自重庆晚报的报道却不单单是车惹的“祸”——

3个月前,杭州进行了公务用车改革:取消专车,改为发放相应车贴,节约归己,超支不补。眼下,该市又准备在局级领导干部中探索一个车改新模式——“包干用车”,即本人不领车贴,所有公务用车由公车服务中心提供。

经常关注时政新闻的读者对3个月之前的这条新闻并不陌生,当时还都认为杭州引领全国公务用车改革之先。而短短的“百日维新”车改还真有那么一点效



谁掌管着公众科学食碘盐的钥匙

有消息称:2009年5月,一项“沿海地区居民碘营养状况”调查由卫生部牵头,在浙江、辽宁、福建、上海四省市低地开展。部分省市甲状腺疾病频发,有医学界人士认为碘过量是重要因素。原本预防大脖子病的碘盐,反而导致市民碘过量,存在巨大的健康风险。

全民加碘的政策始于1994年,当年国家颁布的《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规定:除了北京、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和河南八个碘省市,可不强制定推行加碘盐,其余省市食用盐均强制加碘。但实际上,一些地方盐业公司为追求利润,高碘地区也

果呢!据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车改办主任何新根介绍,3个月来,首批21家试点机关单位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

开支下降32%,却要走向回头路,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有网友调侃说难道“70码”真的成了一句咒语,领导也不敢走路过斑马线,怕被“70码”了?所以宁可少拿一些钱,还是坐公车安全些,可以一出门就上车,用不着在斑马线十来米的地方等出租车。戏说归戏说,车改回潮和复辟的真实原因如相关报道所披露,某局长“抱怨”说打车不方便,等半天等不来出租车,耽误工作,云云。其实,我费了半天劲儿把自己“换位”为官员,觉得原因还不仅仅这些,他们肯定是反复权衡利弊才“官员上访”,强烈要求

回单位坐公车的。尽管我们无法获知杭州车改为什么从“风向标”转为“墙头草”的所有真正原因,但官员们说“拨乱反正”就“拨乱反正”了,这你就不能不服!“世界是你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重温这句非常熟悉的伟人语录,我深深地感到,伟人的话就是伟人的话,也如来自清笔下抱怨的那样“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上述所表,不全是牢骚。为了寻找正确的答案,笔者求助于网友跟帖。你别说,网友的眼睛还真真是雪亮的。众人皆曰:车改的最后结果就是,车贴照拿,公车照用!倘如此,这牢骚不发白不发,呵呵,也怕发了也白发! 党贺喜

如此内退

山东临邑县电业公司一领导干部亲属,13岁居然就编成为正式职工,另一人则是不满16岁入职,两人24岁内退“分流”到老年活动中心。东窗事发后,临邑县电业公司对其作出行政降二级、停发一年全部奖金的处分(8月12日《南方都市报》)。这真是:甘罗十二能相,全凭幼年有才情。尔等天赋非异禀,全靠生为领导亲。同路还在把命拼,你却笑纳“退休金”。瞒天过海坏公平,降级停薪从轻松。 刘道伟 漫画

如此内退

当下,公众对于健康的关注度非常强烈。大家已经不能容忍把自己科学、安全食用碘盐的钥匙,交给不甚讲究科学的监管机构,更不能容忍这把钥匙交给追逐逐利而去的盐业公司。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加强服务工作,对食用碘的添加量进行指导,对不同城市的平均居民碘营养状况进行普查并公开披露;对盐业企业生产碘盐的含碘量精密监督,并强化在市场上明确含碘盐与不含碘盐的同时销售,等等。民众健康无小事。在公众已经起身质疑“全民加碘”在操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时候,政府不能模棱两可,态度不明,而应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回应。 诗成

地方GDP虚高 亟待追究法律责任

今年上半年,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约1.4万亿元。各地数据显示,只有5个省份低于7.1%的全国速度。各地数据加总后,高出全国数据达9.9%。

毋庸讳言,“统计”最大的价值,就是要让数据反映现实,从而发现问题并指导决策。“打架”的统计数据不仅将严重损害统计的公信力,更会对宏观决策造成干扰和危害。然而,地方GDP之和高出国家GDP,基本上已经是一种“惯例”,区别只在于高出差率的大小。

按照我国的GDP核算制度,国家GDP和地区GDP分别独立核算,地区之间的重复统计、使用基础资料的不完全一致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国家GDP与地方GDP之和出现差异。但是,长期单方面较多的地方数据偏高,显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连国家统计局亦不讳言“为了考核过关或政绩的需要,不排除少数地区高估GDP数据的可能”。对此现象,几任统计局局长都曾“痛斥”过;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甚至建议“取消地方GDP的统计”。

平心而论,对地方GDP数字注水,国家统计局也做了努力。2007年,国家统计局决定逐步对各省GDP进行统一核算。只不过,全国范围的GDP统一核算制度未能真正执行,地方GDP注水则更是少有改观,甚至变本加厉。

这一次,统计局将地方GDP之和与国家GDP之间的巨大差异,作为统计信息公开信息直接发布给公众,在我们的记忆中是第一次,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可看做是改变统计注水的勇气表达。遗憾的是,信息的公开程度仍然有限,所谓“少数地区”究竟所指那些地方,语焉不详,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还是在进行数据质量评估之后作出的结论?

无论是96版的《统计法》,还是一个多月前刚刚通过、将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统计法》,都对“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或者“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但是《统计法》实施26年来,这一条款几乎处于“虚置状态”。

一边是政绩考核的严重“GDP崇拜”,一边是有名无实的纸上法律责任,考核机制的不健全和问责法律的虚置,应该是地方GDP数据长期单向畸形偏高的关键原因所在。那么,写在纸上的统计造假法律责任,又要何时才能得到严格追究呢? 于忠